

七月,安徽黟县碧山村,村后青山上烟云笼罩,烘托着山脚下的白墙黑瓦。村口的农庄里,有身穿文化衫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和同伴商量着如何去触摸这个徽州农村,去了解在一场名为“碧山计划”的文化下乡活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哪些变化。

而这种场景,在本月初的一场笔战后,变得越来越常见了。笔战中,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周韵发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质疑欧宁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中,村民是乡村的主体,还是城市精英下乡后的“审美物”?欧宁则认为,女博士空降碧山一天,戴着有色眼镜,抓取一些表面的现象,“使用的话语比她要批判的‘精英话语’有过之而无不及。”

争论很快平静。但关注者们随之而起的好奇心,不容易打消:已发起3年之久的“碧山计划”,到底在做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两人争吵的“路灯VS看星星”是怎么回事?被笔战双方都视为“主体”的村民们,又有什么样的态度?近日,现代快报记者走进碧山,尝试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代快报记者 付瑞利/文 李雨泽/摄

一场笔战

博士质疑谁是乡建“主体”,引发一场论战



碧山书局

一座村庄

自然风光、历史遗存兼具,引来“碧山计划”



碧山村街景

一个愿景

重建一种家乡归属感



村民在餐厅用餐

建路灯方便村民走夜路,还是摸黑方便城里人看星星?一座村庄,一个改造计划,哈佛博士考察后引发一场网络笔战

碧山计划,谁的乡村?



小小的村庄,来了一些文化人之后,昔日的宁静被稍许打破了……

7月2日晚,艺术家、策展人,也是“碧山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欧宁,转发了两条图文微博,内容是南京大学第五届“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走进碧山,在猪栏酒吧听讲“碧山计划”。图片上,可以看到欧宁在使用英文版PPT,为暑期班成员讲解他的种种想法和实践。

欧宁说,之前,曾有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到碧山,那次聊得还不错。所以,当这期主要由中国海外留学生和青年学者组成的暑期班提出想分享一下“碧山计划”时,他欣然答应。不过,就在当晚,网友“@一音顷

夏”发出微博,称听“碧山计划”,被精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话语震惊,乡村建设不过是想象田园。之后的几条微博中,这位网友又提到村民想要路灯,而外来知识分子认为“没有路灯能看星星”。

此外,欧宁使用的英文版PPT、提到的西方典故,以及那本用于记录设想的奢侈笔记本等,也都被认为是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出“碧山共同体”的细节。其实,这个宣称旨在乡村建设,希望通过文化下乡,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社会的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而这次质疑的出现,似乎因为“@一音顷夏”的身份,而备受关注。这位网友的真实姓名叫周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是“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

这场有关“碧山计划”的争论,被抽象为哈佛大学博士和国内艺术家之间的笔战。两人发出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回应哈佛女博士对碧山计划的质疑》等短文,也被简化为极具象征意义的“路灯VS看星星”之战。

尽管有暑期班的其他成员发声澄清:欧宁说到“看星星”时,恰恰是

而这次质疑的出现,似乎因为“@一音顷夏”的身份,而备受关注。这位网友的真实姓名叫周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是“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

这场有关“碧山计划”的争论,被抽象为哈佛大学博士和国内艺术家之间的笔战。两人发出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回应哈佛女博士对碧山计划的质疑》等短文,也被简化为极具象征意义的“路灯VS看星星”之战。

尽管有暑期班的其他成员发声澄清:欧宁说到“看星星”时,恰恰是

洗得欢快。碧山村的晚上,要比城市来得早。下午四五点,站在高处看碧山,黑瓦上已有缕缕炊烟升起。

不过,就这样一个看似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却绝少看见年轻人的身影。

村里一处保持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布置风格的供销社里,几位中老年村民坐着闲聊,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工作。一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祖上传下来的、上百年的老房子里,每日相伴的除了老伴,还有那些粗

热,跳进环绕整个村子的清水沟里,

所以,他选择了碧山,去做“碧山计划”。如今,欧宁已经举家搬到在碧山买的老房子里,加入到新村民的行列中。村民们偶尔会看到,这个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到隔壁的小店里买烟。

可是,一个被他视作有利的条件,却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现实:因为外出读书,很多年轻人不再回家,而是留到城市里。“这就是农村的现状。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农村的年轻精英被吸纳走。”

他认为,人口不足,导致徽州地区的年轻精英被吸纳走。

而这次质疑的出现,似乎因为“@一音顷夏”的身份,而备受关注。这位网友的真实姓名叫周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是“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

这场有关“碧山计划”的争论,被抽象为哈佛大学博士和国内艺术家之间的笔战。两人发出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回应哈佛女博士对碧山计划的质疑》等短文,也被简化为极具象征意义的“路灯VS看星星”之战。

尽管有暑期班的其他成员发声澄清:欧宁说到“看星星”时,恰恰是

洗得欢快。碧山村的晚上,要比城市来得早。下午四五点,站在高处看碧山,黑瓦上已有缕缕炊烟升起。

不过,就这样一个看似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却绝少看见年轻人的身影。

村里一处保持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布置风格的供销社里,几位中老年村民坐着闲聊,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工作。一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祖上传下来的、上百年的老房子里,每日相伴的除了老伴,还有那些粗

热,跳进环绕整个村子的清水沟里,

所以,他选择了碧山,去做“碧山计划”。如今,欧宁已经举家搬到在碧山买的老房子里,加入到新村民的行列中。村民们偶尔会看到,这个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到隔壁的小店里买烟。

可是,一个被他视作有利的条件,却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现实:因为外出读书,很多年轻人不再回家,而是留到城市里。“这就是农村的现状。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农村的年轻精英被吸纳走。”

他认为,人口不足,导致徽州地区的年轻精英被吸纳走。

强调了村民需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文人可能觉得没有路灯正好可以看星星,但村民们没有路灯十分不便,“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误会?”

可“争端一开”,各种声音还是从不同角度发出,在时隔3年后,再次将“碧山计划”拉入舆论的漩涡。最终,这场笔战在周韵的《回应欧宁》发出没多久后,慢慢消停下来。但它的影响迟迟没有退去,碧山和“碧山计划”成为不少人眼中的新鲜存在,“有意思,关注中。有时间要到碧山去看看。”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作为“碧山计划”的一部分,碧山书局的到来,让村民开了眼。书局所在地曾是一座荒废已久的祠堂,里面曾堆满杂物,蝙蝠乱飞,如今却在天井下竖起书墙。还有村民为它的到来感到欣喜,因为期盼已久的商业机构终于出现了。

但在汪寿昌看来,这更是一项“文化事业”。他表示,对“碧山计划”了解不多,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汪寿昌认为,目前来看,“欧宁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总归在做一点事情,“书店免费开放,有村民过来读书,一位老太太曾在这里看完一本厚厚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提起“碧山计划”,有人听过有人“闹不清”

村民怎么说

“碧山计划”实施三年,一场笔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皖南古村:“欧宁们”的乡村建设进展如何,那个美好的徽州模式怎么样了?

7月11日、12日,现代快报记者在碧山村走访发现,除了那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碧山书局,和一带拨来做社会调研的大学生,“碧山计划”留下的痕迹并不多。村里,有的人知道“碧山计划”和欧宁这位邻居,有的人只知道欧宁,还有的人索性摆摆手,“闹不清,闹不清。”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作为“碧山计划”的一部分,碧山书局的到来,让村民开了眼。书局所在地曾是一座荒废已久的祠堂,里面曾堆满杂物,蝙蝠乱飞,如今却在天井下竖起书墙。还有村民为它的到来感到欣喜,因为期盼已久的商业机构终于出现了。

但在汪寿昌看来,这更是一项“文化事业”。他表示,对“碧山计划”了解不多,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汪寿昌认为,目前来看,“欧宁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总归在做一点事情,“书店免费开放,有村民过来读书,一位老太太曾在这里看完一本厚厚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他说,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

哈佛博士周韵对“碧山计划”的质疑,让汪寿昌无法完全认同,他说,有不同意见去探讨,可以相互促进,但没必要给这种实验泼冷水。

其实,在汪寿昌的脑海里,也有一份自己的对于家乡的描绘。他曾用画笔画下碧山的风景,但那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记忆。

7月11日,老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历史上的碧山,汪姓家族特别兴旺,上世纪六十年代,外姓迁入,慢慢改变这个古老村庄的状况。这是第一拨外界力量。眼下,“欧宁们”来到碧山,成为介入他们生活的第二拨外界力量。“我开玩笑说,他们又来改变碧山了。”

这位子女都在外工作的乡贤说,自己观念中,美好的家乡应该是人丁兴旺,老少都有,过着那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最后,老人还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碧山会留不住碧山人?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当然,也有了解情况的村民说,“欧宁老师来了,很多文化人也跟着来买房子,价格翻番了。”村头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在迟疑一阵后,表示自己现在每天卖出去的水,要比以前多了。

直到走进碧山书局,现代快报记者感觉才算“找对”了人。今年4月份,这家开在农村的书店对外营业,碧山村68岁的乡贤汪寿昌,成为这家书店的管理员。而在此之前,汪寿昌只是一位农民。

不少和你一样的文
学爱好者居住。这保护
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
原住民搬走了,
正在变化。
是“土绅化”。村民想
理想进来,这是双方
现在,老房子的价值,
只了。可他们并不愿
而是喜欢住新房子。
要做的,是不让这个
大家能够长久地住下
下来,欧宁已经感到
碧山计划”,对这种
现实感到很无奈。



欧宁:我们很主动,但村民并不很配合

现代快报:“碧山计划”是一种实验?推行起来有哪些难处?

欧宁:它是一种实验,没有时间表,也很难说有很明确的目的,我们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总体而言现在的困难很多。我们最容易被批评的是,说我们太高端,和村民融合得不够。但是,在晏阳初和梁漱溟那个时代,他们也不受欢迎。

知识分子主动,但老百姓被动、不想配合,知识分子的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农民不呼应。很多时

候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在那里叫喊。说乡村是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不是我的,也不纯粹是农民的。

现代快报:“碧山计划”已经停了一年多,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会不会想到离开?

欧宁:今年有了新动向,有一个投资人,买了200亩地,觉得我们的半年庆不错,就在签协议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希望“碧山计划”可以降低一些,县里面同意了。可另外一个难题来了,资金由他们来出,那200亩地用来做什么?我们得慎重,万一以后做了破坏、掠夺性的事情就不好了。至于离不离开,至少现在还没有离开的想法。

所以,开书局的时候,一方面是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要自我造血。同时,要为村民做些事情。

周韵:村民不该是城市精英的“审美物”

识分子建立、为了外来知识分子体验田园”的小团体?

现代快报:碧山村的民居被外来的文化人买下。原住民搬到别处,或者盖起了新房子。欧宁想避免这种“土绅化”。毕竟他所倡导的是激发村民自主性,让村民参与到改良中,而不是卖房子。可现实让他有些无奈。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周韵:看了《南都周刊》2011年对“碧山计划”的报道,就会发现,“碧山计划”一开始,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就是城市文化人下乡买房子定居。他们现在又来反对“村民卖房子”与“土绅化”,我不知道这其中,如何自洽。进一步说,村民卖房子,这个“共同体”是谁的,包括谁?既然“碧山共同体”是“碧山计划”的创始者设计、提出的概念,那么设计之初,自然应该对这个“共同体”里包括谁,有一个定位。

村民期望的是发展商业与旅游业,是可以搞创收致富。村委会对于碧山发展的定位,是一个“休闲文化旅游度假村”。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了“碧山计划”的创始人说要“远离资本远离NGO”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乡村建设”情怀,然而我却并不知道,靠着这种“远离”与情怀,在中国当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体情境中,“共同体”如何能平衡好乡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成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乡村共同体”,而不是“由外来知

识分子建立、为了外来知识分子体验田园”的小团体?

现代快报:碧山村的民居被外来的文化人买下。原住民搬到别处,或者盖起了新房子。欧宁想避免这种“土绅化”。毕竟他所倡导的是激发村民自主性,让村民参与到改良中,而不是卖房子。可现实让他有些无奈。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周韵:看了《南都周刊》2011年对“碧山计划”的报道,就会发现,“碧山计划”一开始,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就是城市文化人下乡买房子定居。他们现在又来反对“村民卖房子”与“土绅化”,我不知道这其中,如何自洽。进一步说,村民卖房子,这个“共同体”是谁的,包括谁?既然“碧山共同体”是“碧山计划”的创始者设计、提出的概念,那么设计之初,自然应该对这个“共同体”里包括谁,有一个定位。